

小说家

XIAOSHUOJIAJIANGTAN

讲坛

王蒙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王蒙 著

JIENA DAQIAN SHIJIE  
接纳大千世界

© 王蒙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接纳大千世界/王蒙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8  
(小说家讲坛)  
ISBN 7-5313-2611-6

I . 接… II . 王… III . 王蒙—演讲—文集 IV .  
I 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2894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

---

幅面尺寸: 140mm×203mm 印张: 12.375 插页: 6

字数: 270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臧永清 施凌飞 责任校对: 白 光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

定价: 2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总序 林建法 王尧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无论你以怎样的“文化身份”出现，你都无法避免文化转型带来的冲突；对一个“写作者”或者“读者”而言，话语的冲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经验，于是，如何言说，在考验着所有“文化人”的品格。

演讲作为言说的方式，或者作为一种写作的方式，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又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丢失了，它在近二十年的复现，与知识分子是否具有话语权和具有怎样的话语权是密切相关的。我们首先在这样的认识中策划了“小说家讲坛”活动。

“小说家讲坛”的构想，源于2001年8月我们在大连聚会时的讨论，并很快得到了许多作家、学者的赞成与响应。这一活动由两部分组成：在苏州大学设立“小说家讲坛”，同时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小说家讲坛”的专栏。

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在这个讲坛上演讲的小说家堪称是“杰出”的甚至可能是“伟大”的作家。关于“杰出”或“伟大”的提法，或许暂时不为一些人接受并被非议，或许会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反感并被谴责。但我们相信以后的文学史会作这样的叙述。熟悉百年中国和世界文学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这二十年当



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但我们常常由于莫名其妙的思想与心理作用，由于学术的或非学术的原因不敢或者不想做这样的表述。——我们认为这是最糟糕的失语。

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无论是跨文化还是在一种文化的内部，对话和沟通是何等的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对话是发现和解释诸多问题的最好方式。因此建立起一个凸现作家主体而又易于与学者、批评家、文学读者沟通的充满活力的“文学现场”，是“小说家讲坛”的又一企图。在这样一个文学现场，作家的言说是自由的朴素的，读者的质疑也是自由与朴素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对话。任何外交辞令在这样的场合都无疑被看成是对真善美的亵渎。在这里，智商的高低与技巧的高超拙劣已经不是主要的，去掉一切伪饰后的自由思想才会为人赢得尊严，嘘声和掌声分别因此而产生。我们所期待的当代文学批评不作知识的考古，具有现场感的听众（包括批评家）的质疑和作家的回应，将淘汰文学研究中的伪问题，筛选出真正的关系到当代文学发展的问题，进而形成一些值得研究的命题。所以，只要你置身这样的现场，你就在倾听的过程中产生着言说的欲望。

这几年设坛开讲已经在大学和其他文化场所蔚然成风，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令人思考的是，这些体制内的运作（通常是这样）却深刻地冲击着体制的某些方面，并且标示了当下思想自由的限度和学术的高度。大学的学术讲座正在逐渐成为学术活动的主体，它反衬了教育的呆板。多少年来，大学的文学教育是残缺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体制内的知识生产，封面是学术，正文却远离学术。我们所有的人只要你怀抱学术良知，就不能不



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学教科书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八股式的说教，人性的、审美的、生命的文学在教条主义的叙述和所谓的研究中被肢解和阉割，并且要一种话语体系协助形成文学的权力和秩序。在堂堂的文学讲坛，缺席的是真正的文学。所谓大学不能培养作家正如大学应该培养作家一样都不是大学的真谛，我们反对以学术的名义驱逐文学。“小说家讲坛”的设立，将会有助于改变这一现象，尽管这样的改变可能是微弱的。

正如我们开始时所说，这个讲坛是有高度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某种话语权，但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尺度，用这个尺度来度量作家。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舍弃，但不是一种拒绝，因为我们所说的“高度”并不是一个绝对不变的“门槛”。事实上，关心这个讲坛的朋友们对邀请谁、不邀请谁也有不少分歧。一些我们认为应该登上讲坛的作家，也有用种种理由来回绝邀请的，尽管我们未必认同那些理由，但是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这就是讲坛为什么会“疏漏”一些作家的主要原因。

这个讲坛逐渐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有朋友甚至说，也许再过多少年，这个讲坛的意义才能更加凸现出来。以后的意义我们暂且不去管它，但是凸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前沿问题，并在演讲与对话中表达作家、批评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确实是“讲坛”试图实现的“现实意义”。我们可能都会注意到在演讲与对话中，小说家们有着不同于别人的心智与言说风格，这些确实是一个杰出作家的独特魅力；在学术的层面上看，小说家们最具意义的也许是他们对若干“伪问题”的揭穿。这似乎是已经演讲的莫言、李锐、张炜、余华几位作家的相同之处。毫无疑问，他们处在困顿之中，



我们应当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在今天都不能没有困顿，但是他们始终不渝地保持写作的尊严，保持对诗的敬畏。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境界，它使一流作家和其他层次的作家相区别。

以“小说家讲坛”命名的这套书，第一辑收入了张炜、李锐、韩少功、史铁生、余华五位作家多年来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录。感谢这几位作家在紧张的写作状态中抽出时间来整理、结集他们的演讲录，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有了他们的响应，才能以今天这样的面貌出现。和其他四位作家不同，史铁生暂时无法走上“小说家讲坛”，但他的书面演讲独具魅力，他的沉思和独语不妨看成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演讲，因此他的这本称为“演讲录”的书有着特别的意义。

第一辑出版以后，热心的读者和学界的朋友便关心第二辑的编辑出版工作，我们因此受到鼓舞，着手第二辑的编辑。此间，“小说家讲坛”的活动由2002年延续到2003年，又有一批作家将在讲坛发表演讲。在草长莺飞的春日，我们邀请到了王蒙、马原。4月21日，在广州出席“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仪式后，马原、林建法先后赶到苏州大学，他们俩在广州已经感受到了“非典”的恐怖。我们仍然准备着马原的演讲活动，海报出了，学术报告厅安排好了。我们谁也没有说，但心里都在担心学术集会有无可能。忽然间，全国上下对“非典”有了高度的警惕，演讲活动终于被告知取消。——这距原定演讲时间不到两个小时，通知发出去时，学术报告厅已经聚集了众多的听众。马原的演讲题为《抓住故事这根稻草》，对听众而言，这根“稻草”有多长就难以预料了，这不是马原设置的“圈套”。同样为大家所期待的王蒙的演讲也难定时日。现在出版的第二辑，收入了王蒙、

莫言两位作家的演讲录。这一辑的出版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以此来纪念“非典”时期的精神生活。

这套演讲录的出版，将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还原小说家的思想风度和演说风格，因为有了广大读者的参与，“小说家讲坛”也就有了新的时间、空间和人物。——“小说家讲坛”不仅仅是“小说家”的。



005

总  
序

# 目录

总序 林建法 王 尧 001

## 一 文学悖论

- 文学的悖论 003
- 文学底方式 021
- 作为艺术的文学 042
- 文学是必要的吗? 068
- 挑战与和解 085
- 文学互证论 110
- 文学与社会的互动 128
- 小说创作与我们 154
- 感谢与祝贺 182
- 对于价值的尊重 184
- 敞开心胸, 欣赏与接纳大千世界 189
- 华文创作的魅力 208
- 关于90年代小说 212
- 当今文坛泡沫多 221
- 关于小说鉴赏 225
- 说“无端” 239



## 二 文化话题

-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大国”建设构想 261
- 全球化能把中国文化怎么样? 296
- 一要继承 二要发展 302
- 扎实实搞学术 306
- 不同文化间的对话 309
- 文化大国建设刍议 313
- 把中国建设成为文化大国 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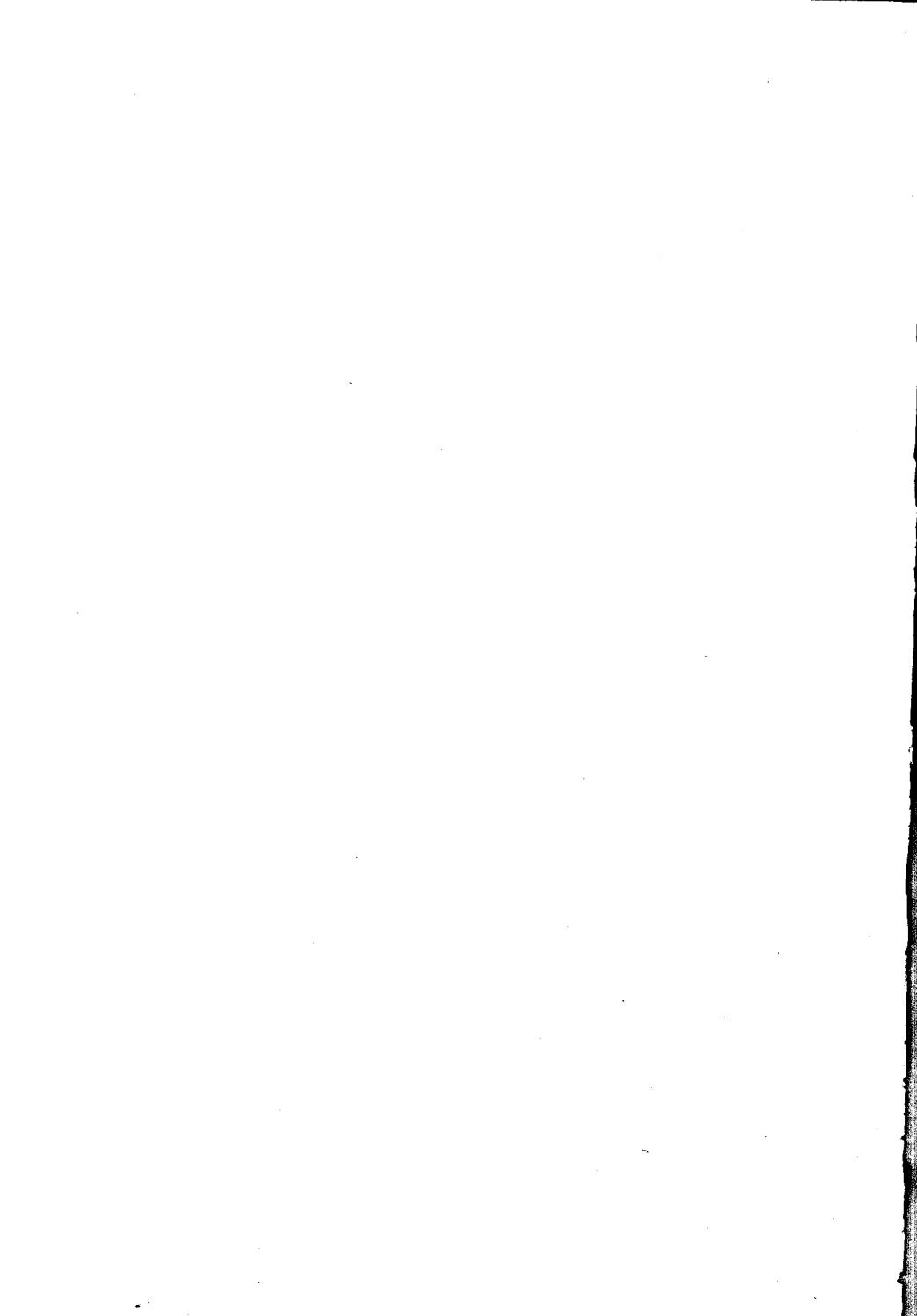
## 三 明朗人生

- 理解比爱更重要 323
- 我永远是学生 332
- 从“青春”到“饱经世故的清明” 338
- 不要以为自己就是尺度 342
- 把自己没有趴下的经验告诉大家 348

## 四 海外言说

-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走向选择 353
- 谁来拯救文学和文学能拯救谁? 361
- 世纪之交的华文写作 367
- 小说和电影中的中国人 370
- 从修齐治平到大公无私 374
- 文学不再高姿态是正常的 379
- 想起了詹姆斯·乔依斯 384

# 一 文学悖论





# 文学的悖论

感谢各位在这里听我讲，作家的任务应该是写，讲得再天花乱坠不如写出一篇好的作品，就像篮球运动员的任务是投球一样。“文学的悖论”就是说在文学上有各种各样的理论，而且有很多理论是互相悖谬的，是互相违反的。比如，别人说王蒙的小说写得不错，你说写得很差，你绝对是有道理。别人说《红楼梦》看了以后很有收获，你说没有收获，看了以后有害处，你绝对说得也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我们探讨一下，文学本身有一些互相违背的命题，又都能够成立。

文学是一种游戏，还是一种使命呢？说文学是一种使命，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比如说鲁迅，他本来是学医的，但他在日本看了电影，看到中国人的不觉悟， he 觉得光医治人的身体是不够的，还要医治人的灵魂，所以他选择了文学，要对整个国民精神上的毛病进行治疗，这说明文学是为了救国救民。还有很多伟大的故事，比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和《汤姆叔叔的小屋》是有关系的，由于这部书激起了解



放黑人的热潮，使美国甚至于发生了规模很大的内战。再如，巴金先生最喜欢举例的是高尔基写的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勇士丹柯，讲的是丹柯和一群人被困在树林里，丹柯把自己的心挖出来当做火炬，用来照耀，带领大家走出黑暗的森林等等。

许多作家也用许多事实更多地强调文学是一种智力的、精神的、心理的游戏。文学本身有很大的游戏性，通常说是“解闷”。有很多高级领导说我也读小说，换换脑筋，就是为了休息一下。比如《红楼梦》的作者，说写此书就是为了让大家“消愁破闷”。法国的《世界报》曾向世界上几百个作家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写作？回答得最严肃的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特别是中国的老作家，譬如巴金老先生回答：是为追求光明，同情青年人，给青年人争取更好的未来。老作家马烽回答：由于日本的侵略，使中国陷于危难之中，我要用我的笔唤醒我的同胞。丁玲的回答是：从小生活在封建的家庭，要争自由，争解放，争进步。可是我们会发现那些发达国家的一些有名望的作家似乎很不认真地回答，譬如英国的一个女作家——朵利斯·莱辛——她的《金色笔记》已在中国出版，她有很多以南非为题材的、同情南非黑人的作品——她回答说自己是写作的动物。回答得最有趣的是德国的根特·格拉斯，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回答是因为自己干别的事都没干成——这话也不无道理。因此，文学既是严肃的，有神圣的社会使命，有责任感的，比如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梦，用文学铸造国魂，或者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等等，但确实也存在着一种现象，有大量的文学作品有一种娱乐性。

文学是个人的还是集团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所谓新新人



类的作家强调写作是个人的，是写给自己看的，与别人无关，（认为）我不需要读者、拒绝读者、拒绝阅读、颠覆阅读……这些作家说话往往很极端，很绝对，很夸张。作家很会用词，因为他们靠词吃饭，人们不要完全相信。有人强调个人，甚至说我的写作是在说梦话，我不与别人交流，就是个人的事情，这样想也是有道理的。这不像其他事，比如装配一辆汽车，盖一座房子，这些都不是一个人的个性。但你能说它又完全是个人的吗？个人本身的出现是和历史有关系的，和一个集团、阶级、种群有关系，甚至和一个地区、民族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文学是一个集团的，虽然以极端个性化的方式来表现，但它仍然是一个集团的代表。

再譬如说，文学究竟是历史的，还是超时空的？有一种说法强调文学是超时空的，即文学的意义往往比其他精神现象的寿命更长——当然必须是优秀的，它往往超越时空，超越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如果我们不是专门从事研究，喜欢莎士比亚戏剧的人没有几个能说清莎士比亚到底生活在什么年代？当时英国政治情况到底怎样？他的戏剧超越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当时的社会情况怎么样？当时的民生情况怎么样？当时的社会矛盾怎么样？没有多少人会去想这些问题。文学往往具有一种非历史的意义。比如我们都喜欢李后主的词，但是李后主是一个亡国之君，他的词的悲哀表达的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悲哀，那么“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他的特定的愁。但每个人的愁是不一样的，如果学生考试总是不好，也会觉得他的愁像一江春水向东流，如果你失恋了也会觉得非常愁，如果股市失利也会觉得很愁，但是这个愁抽象到了李后主，就成为超越历史的东西。



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意象永远存在。

我们大家都看《红楼梦》，但是与曹雪芹同时的其他人的书包括那些策论等，除了专家以外，没什么人看。所以说文学的这种精神现象确实有它超越历史的一面。然而它本身又是历史的。即使《红楼梦》你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不可能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作品，不可能是汉朝时的作品，也不可能是美国、德国的作品，也不可能抗日时期的作品，所以它是非常历史的，但又是非常不历史的，它是非常超越的。

形式逻辑最讲究同一律、否定律和排中律。同一律就是说什么是什么，否定律就是说什么不是什么，排中律就是说不可能同时又是又不是。但在谈论起文学来，我常常觉得左右为难，我常常觉得都对。你说文学是历史的，我可以马上对你表示文学确实是历史产物，离不开历史的条件；你说文学是超时空的，我也马上能够接受，可以举出许多具体事例。这并不是因为我在谈起文学来特别狡猾，而是事实如此，它本身就是两个悖谬的东西同时存在。

文学究竟是直观的、还是思辨的？它是理性的产物、还是非理性的产物？有人强调文学是直观的，是先验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是不可解释的，是下意识的，这在文学创作中起的作用特别大，至少比做数学起的作用大，比你找一份好工作起的作用也大。比较极端的主张在欧洲早就有，即所谓自己写作，也就是排除自己的理性的思索，而是有点像练气功入定一样，进入一种情绪，挥笔而书，不停地运转，连自己写的是什么都说不清楚。这听起来有些可笑，外国有，中国也有。有一位著名女作家叫残雪，就是这样主张，她在美国



哈佛大学讲演，美国人都不信，同她争论，认为不可能，但残雪回答确实如此，她说：“我想到自己要写什么，我马上要控制自己不要写，不要想，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因为一想，理性的干扰就会太多，而我坐着的时候，各种的印象、心情、词语纷至沓来，自天而降，像下雨似的，灵感之雨，下到纸上。”有很多人觉得难以想像，我呢？我大致相信。你们看，我又狡猾起来了，就是说不会绝对的不想，但是比较信马由缰，让自己的想象和心情充分发挥出来，忘记一切，各种相连贯的、不相连贯的、最绝的词、最绝的印象、最绝的意识的流动都在自己的作品里流淌而出，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更多的作家在文学中是充满了思辨的，是有计划的，有目的的。据说茅盾先生写作之前都有详细的提纲，提纲写得基本差不多，在此基础上加以丰满、润色，一部好的作品就写出来了。强调思辨性的人就必然强调作品的思想性，所有的描写都表达了一定的思想，表达了对人生、宇宙、社会、爱情、家庭、人际关系、道德、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思想。

有一种说法：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思想家。比如说作品中有妇女解放的思想、人道主义的思想、对社会不公正的种种批判的思想等等。过去这种文章非常多，因为作家是站在时代思想的制高点上，所以才能写出很好的作品。所以我们对一部作品的评价一定要从它的思想意义上加以评价，它不仅仅是一部好读的文学作品，而且是思想上的象征、旗帜或标志。根据这种理论我们对《红楼梦》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曹雪芹高于当时一般的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因为他同情女孩子，对封建家长制的婚姻制度做了实际上客观